

场域理论视角下创意改造对乡村建设的价值研究

——以东梓关村为例

汤艺一¹

（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在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村庄通过创意改造以及价值观念重塑全面渗透从而实现村庄村貌改造、村民审美培育、生活品质提升等目的的成功实践。东梓关村通过乡村空间场景、建筑景观、节庆活动的创意重塑实现了乡村文化振兴。针对调查地点进行田野调查，以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基础，得出了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乡村聚落的重塑、乡村文化活动的重造等文化创意设计活动的具体方式对于乡村文化场域发生改变从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结论。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 创意改造 价值提升 场域理论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20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必须攻克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必须补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农民脱贫和实现全面小康奠定了良好基础。

构建乡村文化生态系统，重塑乡风文明，实现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乡村持续发展繁荣的内生动力和核心保障。创意改造活动从文化内涵出发，将其融入到相关的创作中，在乡村开展相关创意设计可以唤醒一个地区的群体记忆，搭建起新旧事物之间的桥梁，为当地村民的价值归属和情感认同提供获得途径，村民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中，乡村创意改造通过艺术化的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为乡村提供“造血”功能。经历过创意改造后的乡村、乡民与艺术共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乡村美好生活得以实现。

1 乡村文化振兴困境

“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客观上给乡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变化。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界限日益模糊，一方面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在农村开始形成；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也对传统的乡村习俗、乡村礼仪等乡村文化造成冲击和破坏，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乡村传统文化价值观衰落

随着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现代城市文化对于乡村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渗透。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简化了许多传统乡村文化中的礼仪、习惯等，对于乡村传统文化发起了挑战。传统文化在社会进程中逐渐为现代文化让位，乡

作者简介：汤艺一（199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政策与法规。

土文化明显弱化于城市文化。而且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乡村文化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在削弱，乡村文化已经从核心地位滑落，随之而来的则是乡村文化价值观的衰落。

1.2 乡村文化传承断裂

我国城乡二元制度容易导致城市和乡村产生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光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在文化发展方面也有所体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乡村文化的边缘性比较明显，城市文化处于强势中心地位。农民作为乡村中的主体，对于城市有向往和期待，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乡村资源大量向外流失，造成村庄出现严重的空心化问题，农村主体大多是留守老人和儿童。“村庄内部文化承接主体的缺失使得乡村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乡村文化断裂的重要原因。”

1.3 乡村文化生活匮乏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乡村面临许多矛盾，乡村经济基础薄弱无法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农民文化消费水平普遍偏低。“当前，一些乡村经济发展状况不佳，村集体收入少，村民不富裕，严重影响了乡村文化的建设发展。”乡村经济建设作为很多乡镇政府的第一发展要义，却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乡村文化建设，农民体验文化生活的途径单一。当前乡村文化振兴主要面临乡村传统文化价值观衰落、乡村文化传承断裂、乡村文化生活单一等困境，乡村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此类乡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不足的危机。

2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2.1 场域理论概述

“场域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他指出场域是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造，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场域既是一个包含着潜在的和活跃力量的空间，也同时是一个旨在维护或改变场域中力量格局的斗争场所。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围绕着社会实践而展开，试图利用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回答作为行动者的人类在哪里实践、用什么实践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在乡村创意改造活动完成的过程中，文化场域发生了巨大改变，“处于文化场域中的人们，以‘文化’为标准，规范着自我的思想观念与言行举止，形成了与‘文化’相一致的道德情感与行为方式。”从客观上来说，文化场域在各行动者的带动下发生变化，反之这种变化又重新发生在这个场域内的行动者上，整个场域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产生良性的动态变化。

将此理论延伸到乡村文化建设体系中，可以得出乡村的“文化场域”理论。乡村文化场域的建构受到多种力量的制约和影响，孟祥林提出“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国家干预、市场机制以及乡村精英三种力量相互交融，共同影响着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乡村创新改造通过对场域内的物质和客观环境产生改变从而引发场域内新旧力量产生冲突，最后使得场域发生变化，场域中的群体也随之受到影响。乡村创新改造通过影响乡村文化场域进而使得场域中的群体产生全新的价值观念，对乡村进行创新改造是一项富有创造力和文化底蕴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价值重塑是真正“以文化人”的结果，对于乡村文化振兴有着深刻的意义。

2.2 乡村文化场域现状

“中国乡土社会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有着历史维度，储纳着人文情怀、文化传统、社会记忆和群体意识的复杂场域。”其中，由乡村文化及其载体产生的与文化相关的各种关系围绕资本展开叙事的社会空间系统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场域，其中文化空间场域、文化礼俗场域和文化活动场域是乡村文化场域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

文化空间场域中承载了村民生活的集体记忆，包含了日常生活的物质空间以及村民精神上的文化需求空间。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日益凋敝，原本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塑造上都逐渐解体凋零。

文化礼俗场域中的礼俗通常为建立在一定的家庭、宗族基础上的文化习俗活动，承载着家庭的期望和精神追求。但近年来，由于乡村人口数量的减少和老龄化程度的加重以及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传统的乡村文化习惯受到冷落。

文化活动场域由于乡村的空心化，其中参与的群体大量变少，加之现代社会对于传统乡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审慎态度，使得乡村文化活动场域的影响力逐渐消解，乡村和城市的互动匮乏。

3 东梓关村创意改造与价值重塑探讨

3.1 新杭派民居回迁房——乡村聚落重塑

东梓关杭派民居回迁房于2015年4月15日动工兴建，2016年8月交付，2017年春节前夕就有村民入住。该回迁房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孟凡浩团队设计建造，在动工之前，设计师团队就深入到当地居民中进行实地调研，在了解村民实际需求的同时追溯了他们的集体生活记忆、生活习惯和传统习俗。东梓关村新杭派民居的建成被认为是探索出一种适合乡村大规模人居环境的改善策略和操作模式，实现“示范”作用，兼具审美和实用，能够在其他乡村中被推广使用。

新杭派民居与东梓关村现存的纳入保护计划的清末民初老式建筑之间没有明显的分隔界限，新老村落既是分散的但也有建筑风格等方面的连结，建筑风格整体统一。设计从四个基本单元出发，进而衍生出多种组团形式，再由组团构成村落，并在设计中迁移了一幢老房子复建在中心位置，改造成乡村图书馆，形成整体聚落感。

3.2 村民活动中心——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

设计师团队在回迁农居以北、新老村落交界处，设计了一座村民活动中心。作为承载全体村民的公共活动场所，设计以较小的尺度单元承载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细微性。集会、看戏、红白喜事等相对重要且人群密集的场所，则可通过合理的布局将空间再次整合。开放式的大平台空间、农家书屋、室内体育活动场馆等娱乐休闲设施及村内候车点的遮阳休息亭等便民设计公共空间的重构，强化了公共空间为村民交流和娱乐的社会功能。

此外，该村民活动中心的建筑过程也由当地村民亲自参与其中，包括墙体石材的打磨、当地常见建筑材料的搜集等，这样的建构方式也为村民价值感归属的表达提供了途径。村民活动中心是关于公共性的实践和时间记忆的存储，由村民施工队共同参与并最终投入使用。这样的建造模式能激发甚至自发形成公共活动，而建筑则作为一种媒介，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最大化连接。

3.3 品牌文化节——乡村文化活动重造

除了改善东梓关村村貌，当地政府也一直致力于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打造东梓关村品牌效应，加强城市和乡村的连结，激发乡村活力。政府的鼎力支持，让东梓关成为闪闪发光的“明星村”。2018年乡村百花大会、2018年富春江江鲜大会、2019年东梓关首届年俗节等多场大型活动的举办，都成为东梓关村一张张响亮的名片。

乡村文化活动的重造是乡村特色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综合性表达，也是集品牌打造与文化传播于一身的大型艺术活动。乡村创意改造所带来的价值提升一定程度上依托于持续性的乡村艺术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这些文化娱乐和庆典仪式等活动在吸引社会关注的同时，提升着村民对乡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东梓关村近年来积极开展的符合现代人文化需求的系列活动，畅通了文化服务活动的“最后一公里”，文化活动走入了村民生活的同时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此外，新媒体时代，网络的力量也让乡村活动受到社会更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来到东梓关村，引来城市人口的回流，经济集聚效应进一步放大，城市和乡村的互动增多。东梓关村的人气也在无形中改变着当地村民对他们所生活的村庄的认同感和价值判断。

4 乡村创新改造促进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探究

从场域理论的视角剖析乡村创意改造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可将主体分为领导者、组织者与被参与者。这三种主体主要包括当地政府、居民、乡贤、创意改造者、旅游者、移民、旅游企业、媒体、学者等群体，每个群体又可以处于不同的主体中，完成创意改造活动，完成乡村价值提升。

在上述以东梓关村为案例的分析中，乡村创意改造实践的直接结果即在乡村文化场域中产生的变化主要是当地政府、创意改造者作为场域内的领导者，居民、旅游企业、媒体作为组织者，旅游者、移民、学者作为被动参与者在目的地文化场域空间载体中进行的一种以乡村文化氛围环境改善为主，以有形旅游商品的生产为辅，以及前述各主体间博弈权衡形成的全新社会关系。

从东梓关村的成功实践中我们可以借鉴经验，作为开放的参与式的活动，创意改造活动的参与主体应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客观了解村民生活环境为前提，始终将村民作为创意改造活动的主体核心考量，赋予其发言与决策的权利，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外来者”的帮扶，激发村民广泛参与的热情，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4.1 政府明确责任，发挥统筹监督作用

乡镇政府承担着推动乡村经济进步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提供乡村公共服务的职能，一方面对上级政府负责，一方面指导乡村发展，处于国家与乡村的中间位置。创意改造活动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得以合法开展，因此，政府在乡村创意改造活动中是权力主体，对于乡村建设起决定性作用，当地政府对于创意改造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创意改造活动是持续进行的，短期经济效益的获得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地政府需要转变思想，从整体出发，以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作为工作目标，在创意改造活动中担任监督者、合作者，起到统筹资源的作用。

4.2 乡贤联系纽带，强化村民自治意识

创意改造乡村的实践中，艺术创作者作为介入乡这一熟人社会的陌生人，难以取得村民信任，与村民直接沟通成本较高，但我国国情中，村民自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村两委虽确实促进了艺术家与村民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但也存在着追求政绩、过度行政化，忽视村民利益诉求等表达。而本土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民自组织的缺位，如东梓关村创意改造中本土乡贤理事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出面调节了村两委、艺术家与村民三者之间的沟通问题。

从中国乡村治理历史来看，传统乡村社会的自治权力由族长、乡绅和各类精英所掌握。乡村社会在当今依然强调情理的重要性，自治组织需要能够在情理上得到村民认同的精英构成。正如包威尔在描述自组织时指出的那样，“自组织应不同于基于权力关系的层级治理以及基于交易关系的市场治理，是第三种治理机制”。若想调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需要建立以认同为基础的信任，才能在村民原子化现象严重的今天，实现各主体的合作。

4.3 村民全程参与，推动改造持续发展

乡村创意改造的难点在于村民与创意改造者之间存在审美观念、道德理念与生活习惯的不同，这会直接导致乡村创意改造活动的推进存在障碍。应该注意到，创意改造者介入乡村建设不是“入侵式”，也不是完全“哺乳式”，而是艺术引导介入，创造新文化的一种“造血式”的建设方式。为此，艺术创作者不应用现代文明解构乡村文明，而应帮助乡村进行文化的自我生产，

在此类创意改造的过程中，村民和艺术创作者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村民需要成为创意改造活动的见证人、设计师和建造者。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集体共同记忆的载体，也是乡村集体文化和社会规则的载体。”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需要村民主体积极参与其中，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和民风民俗都折射出了乡村的文化，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也需要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比如乡村可以打造适合村民日常娱乐活动和举办红白喜事的开放型公共文化空间，一方面通过群体性活动使得村民聚集，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服务作用；另一方面，村民在这种公共精神的感召下，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激发自身的内在修养提升行为自律，产生强烈的价值归属。

5 结语

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厘清村庄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把握新型文化形态，找到可以提高乡村价值的落脚点促进乡村文化繁荣。目前，乡村建设吸引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进行创新改造，创新改造活动基于文化创意进行，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乡村进行创意改造活动可以赋予乡村更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从而推动乡村的整体社会文明价值，推动新农村建设，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政府主导、村民参与以及相关创意人才的辅助支持。

参考文献:

- [1]蔡瑞林, 陈万明. 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和传承[J]. 中州学刊, 2014(11).
- [2]戚迪明, 刘玉侠, 任丹丹. 转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反思[J]. 江淮论坛, 2019(06).
- [3]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一反思社会学导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4]陈健, 郭淑新. 坚定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需厘清三大关系——基于文化场域视角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
- [5]孟祥林.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困境、向度与方向[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19(06).
- [6]段小虎, 闫小斌, 荆皓. 从“农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振兴”: 研究维度与思维模式的转变[J]. 图书馆, 2018(09).
- [7]黄磊, 胡彬, 刘桂发. 参与式发展理论: 一个文献综述[J]. 大众科技, 2011(11).
- [8]Powell, Walter. 1990.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12).
- [9]吴燕霞. 村落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福建省屏南县廊桥为例[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01).